

北大中文文库

林焘文选

好的文章吟诵起来节拍匀称、抑扬有致，讲究韵律的和谐正是汉语语音的特点之一。语音学固然是语音学家的事情，但母语语音能力的培养应该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林焘 著/王韞佳 沈炯 编选



林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林焘文选

林焘 著/王韞佳 沈炯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焘文选/林焘著;王韞佳,沈炯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801-0

I. ①林… II. ①林… ②王… ③沈…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257 号

书 名: 林焘文选

著作责任者: 林 焘 著 王韞佳 沈 炯 编选

责任编辑: 李 凌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801-0/H · 264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7.5 印张 252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焱、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

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言

本文集收录了 17 篇文章,按照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一、汉语规范化研究(2 篇);二、北京话研究(7 篇);三、语音与语义、句法关系的研究(2 篇);四、实验语音学研究(3 篇);五、汉语史研究(3 篇)。下面对收入本文选的学术论文逐篇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 汉语规范化研究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1955 年)

文章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普通话、大众语和文学语言的关系;二、文学语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三、汉语规范化工作中要注意避免的几个倾向;四、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的规范问题。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汉语普通话的官方定义尚未正式发布,因此这里的“普通话”指的是“不纯粹的北京话”,即过去所说的“蓝青官话”。文中的“文学语言”也不专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是指书面语。这篇文章所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规范化工作建议,迄今为止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例如,林焘先生强调指出,语音规范不能离开北京音系,规范化就是给语言的发展制定出一定的规范,因此规范是活的。这些看法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北京音系与标准语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克服语言规范中的教条主义有着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1959 年)

文章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汉语词汇规范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词汇规范的主要依据;二、方言词的规范;三、古代词语的规范;四、外来词的规范;五、词义的规范。文章认为,词汇规范不能提“标

准”而只能提“基础”，因为词汇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文章分析了方言词、古语词和外来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地位，并对如何规范这些词语以及如何取舍完全同义词分别提出了一些原则。这篇文章关于词汇规范化问题的思想显然受到了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精神的影响，由于它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思路，因此对后来的一些《现代汉语》教材词汇部分的编写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部分 北京话研究

《北京话的连读音变》(1963年)

文章把北京话中的连读音变分为不自由和自由的两大类，并对这两大类分别列举了6个和12个小类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自由的连读音变包括了上声、去声和“一”、“不”的变调、语气词“啊”在不同音节之后的音质变化。自由的连读音变包括三音节词中间音节阳平的变化、韵尾[n]受逆向同化作用的影响发生的变化、不送气的清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受顺向同化作用发生的浊化、零声母音节受顺向同化作用产生的增音、语气词“啊”不属于不自由音变的变化、轻音音节中韵母的种种变化、轻音音节中声母的脱落。文章还就北京话中是否存在[m]尾韵以及语气词“啊”在书面语中汉字书写形式的变化所反映的语气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文中关于连读音变的许多内容后来都被各种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所吸收。

《北京话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1982年)

文章分析了北京话儿化韵中三种个人读音分歧，第一种是以/a/为韵腹的韵母儿化后的读音分歧；第二种是单韵母e儿化后的读音分歧；第三种是韵母ie、üe儿化后的读音分歧。这篇文章着重讨论的问题是，在音位分析中如何解决儿化韵的读音差异。例如，有人认为“板儿”和“把儿”不同音，它们的读音分别为[pər]和[par]，这样，在儿化韵的系统中[ɐ]和[a]就形成了对立关系；但是对于不区分这两个韵母的人

来说,这两个元音又不能形成对立关系。文章还分析了儿化韵中本韵韵尾或者韵腹的脱落是否属于音位性的脱落,如果是音位性的脱落,那么,有些语素就会产生一些复杂的语素音位变体,例如,如果认为“事儿”中的“事”原有韵腹的脱落是音位性的,那么就得承认这个语素有一个读音为[ɿ]的语素音位变体。文章认为,在分析儿化韵的音位结构时,可以引入一个“零变体”的概念,即,音位变体的语音形式可以为“零”。如此,儿化韵中元音的对立问题和复杂的语素音位变体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例如,不管是否认为“板儿”和“把儿”同音,两派读法中“板”的韵尾([n])都是零变体,因此两派的分歧仅仅在于音位/a/的变体在 anr 和 air 两个韵母中是否相同而已。

《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1985 年)

文章讨论了北京口语中去声连读的一种变调形式,即,前面的去声变为与阳平同调值的升调。这种变调形式是北京话的一种社会变体。文章分析了与这种变体相关的几种因素:发音人的文化程度、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区。这种变体在北京东郊出现得最多,其次是城区和南郊,在西郊和北郊出现得最少。从发音人自身的因素看,年龄大的、女性和文化程度低的发音人念升调的分别多于年轻的、男性和文化程度高的。但总的说来地区是影响去声连读变调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篇文章还提出了语音研究中样本采集的方法问题:首先,应当重视日常口语而不仅仅是使用孤立词或词组作为调查语料;第二,应当重视文化程度较低的发音人。

《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1991 年)

北京东郊的平谷县阴平和阳平的调值与北京城区话恰好相反。文章调查了处于两种调值交界地区的阴平和阳平的读法。在这个地区,阴平和阳平的调值处于渐变状态,从东到西阴平的调值有升、中平和高平几种类型,阳平有高平、高升和中升几种调型。文章还发现,在连读变调中,阴平念成高平调和阳平念成中升调的比例高于单念的时候,也就是说阴平和阳平在连读中出现了变调现象。这说明东郊的阴平和阳

平调值在向城区调值转化过程中,连读变调走在了单字调的前面。文章还将东郊阴、阳平的变调与去声连读变调的读音差异进行了对比。这两种现象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新词的读法倾向于与城区相同,而旧词保留旧读的比率较高。这种变化与通常语音演变从使用频率高的词向使用频率较低的词扩散的方向恰好相反,文章认为这个结果是北京标准音通过媒体等渠道影响方音的结果。

《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与沈炯合作,1995年)

学界一般都认为北京话的儿化韵数目比本韵数目少,这是因为有些韵母儿化后读音变得相同了,但是儿化韵音质的异同在北京话中存在复杂的社会变体,这篇文章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了北京话城区、东南郊、西南郊、东北郊和西北郊5个区域26个调查点中16对儿化韵的分合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低元音韵腹的韵母儿化后合并率最高,“把儿”和“瓣儿”、“褂儿”和“罐儿”的合并率都达到了80%以上;中元音韵腹韵母的合并率受到了声调的影响,去声音节韵母的合并率相对来说较高,例如“歌儿”和“跟儿”的合并率只有10%左右,而“这儿”和“阵儿”的合并率达到了40%;后鼻音韵母和相对应的前鼻音韵母或非鼻尾韵母儿化后的合并率基本上在10%以下,例如“瓶儿”和“皮儿”的合并率只有5.81%。文章还分析了发音人的性别、民族、文化、年龄和居住地对儿化韵合并率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性别对儿化韵的分合没有影响;在汉族、满族和回族三个民族中,满族的儿化韵合并率最高;文化程度对于本韵为非后鼻音韵母的儿化韵的归并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于不同组儿化韵分合的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方式,非后鼻音类的儿化韵年轻人合并率较低,后鼻音韵母和前鼻音韵母的儿化韵,老年人合并率较低。文章认为,不同组儿化韵的分合与发音人年龄之间貌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是由两种弱化现象导致的,韵腹元音央化程度的弱化导致年轻人倾向于分辨非后鼻音类的儿化韵,由后鼻音韵母变来的儿化韵中韵腹鼻化色彩的弱化导致年轻人倾向于不区分前鼻音韵母或非鼻尾韵母和后鼻音韵母变来的儿化韵。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儿化韵分合的地区差别。在所调查的五个地区中,儿化韵合并率由高

到低的排序为：城区、东北郊和西南郊、东南郊、西北郊，20%以上的高合并率地区形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中轴线。文章强调指出，儿化韵语音分歧的地理分布与北京话声母合口呼零声母 w 和 v 两种语音分歧的地理分布颇有些相似，这两种语音分歧在分布上的相似性并非共时的巧合，而是北京话历史发展的结果。

《北京官话溯源》(1987 年)

人们一直都有一个感性认识，即，与北京话最为相似的是在地理上相隔较远的东北地区的方言而不是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方言。这篇文章追溯了现代北京话形成的历史过程，着重分析了北京话与东北方言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北京官话区。北京官话区是指从东北地区经过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市区的这一片相当广大的区域，在这片区域内，各方言的声韵系统十分接近，调类完全相同，调值极其相似。此前，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北京官话区”并不包括东北方言。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阐述了自唐代到明代北京话的历史演变过程。北京话自唐代以后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处于与中原地区的汉语方言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则保持了密切的接触，因此北京话可能在辽金时代已经成为发展速度最快、内部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元代的大都话可以看成今天北京话的源头。由于迁都和移民的关系，明代的北京话吸收了各种汉语方言的成分，入声字已经跟现代北京话一样派入了平声、上声和去声。文章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回顾了辽、金和满族入关前东北地区民族和语言的情况。自辽至清，不断有大批汉人、特别是幽燕地区的汉人被掠至东北居住，这些汉人在带去了较为先进的文化的同时，也带去了幽燕地区的汉语方言，金开国之前，汉语在女真贵族当中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汉语在东北地区各民族的语言中已经具有了重要地位，而东北地区的汉语正是在以燕京话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在满族的形成过程中，汉语已经成为满族人的通行语言。文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满清时期北京市区的人口分布情况以及内城和外城存在的语言分歧。外城居住的主要是汉人，说的是北京本地

话;内城居住的主要是满人,说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这两种汉语方言以及其他汉语方言在北京通过长期的接触,互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北京话。

《北京官话区的划分》(1987年)

文章以《北京官方溯源》的结论为基础,讨论了两个问题:如何划分北京官话区和如何界定北京城区话的范围。文章提出了划分北京官话区的三个标准:声韵系统与北京话无重要差异、调类与北京话相同、调值与北京话相似。东北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的绝大多数方言都满足这三个条件。在以北京市为起点,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形成的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一个喇叭形区域内,声韵系统基本相同,调类完全相同,调值基本相似,这就是北京官话区的范围,它包括了河北省东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约有1亿。北京官话区在调值上的差别表现为从西向东调值逐渐降低,以阴平的差别为最突出。文章提出以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是否为零声母作为划分北京城区话的标准,将这些字读为零声母的区域是整个北京官话区西南角上一个很小的区域,包括了北京城八区以及通州、顺义、昌平和怀柔等郊区的部分地区。但是,由于普通话的巨大影响力,这个区域正在逐渐扩大。

第三部分 语音与语义、句法关系的研究

《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1957年)

这篇文章全面考察了趋向、可能、程度和结果补语中的轻音现象。“起来”为例,当“起来”在句子中充当趋向补语时,两个音节都必须念成轻音,词义为引申义;当“起来”充当可能补语时(否定式),词义仍然是引申义,但两个音节都是非轻音;当“起来”在句子中充当主要动词时,词义为本义,“起”为非轻音,“来”为轻音。这篇文章还分析了北京话中程度补语前的“得”的来源。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些

学者认为它是由“到”变来的,有些学者认为不是。林焘先生认为,程度补语前的“得”在北京话里有两种读音:de 和 dou。只能念 de 的“得”和既能念成 de 又能念成 dou 的“得”的来源不同、用法也不一样。前者来自“得”,后面不能跟主谓结构的补语;后者来自“到”,后接主谓结构的补语。这篇文章关于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中轻音现象的一些论述今天已经成为许多《现代汉语》教材的内容。文章还分析了与轻音相关的其他语音现象。例如,在讨论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时,林焘先生指出,补语中轻读的“不”在句法关系上跟后面的结构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因此它的音高也受到了后接音节音高的影响,这个现象说明轻音的高度不仅受到前面音节影响,在一定的情况下,同时也要受到它后面音节的影响。

《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1962 年)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轻音音节与有声调的音节处于不同的语音层次;二、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彼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语流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轻音,其一为语调轻音,可以出现在语句的任何位置,属于语调范围,一般有语调重音与之对立;其二为结构轻音,只能出现在非轻音之后,大部分没有与之对立的轻音,少数结构轻音如果变为重,会对句法结构或词义有重要影响。文章总结了五类结构轻音(后来的学者也称之为语法轻音),并对补语中“不”的轻音性质、介词结构作补语中的轻音问题以及“名词+方位词”中的轻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其中对动词之后介词结构中的轻音和“名词+方位词”结构中轻音的分析很值得注意。对“住·在北京”之类的结构,历来有两种分析法,即“住//在/北京”(述宾结构)和“住/在//北京”(述补结构)。林焘先生认为,这里的“在”应该看成结构轻音而不是语调轻音,因为语调轻音都有重音与之对应,而这个“在”没有。也就是说,“在”的独立性很差,是黏着在前面的动词上的,因此,这类结构就适合分析成述宾结构。此外,这种结构中的介词可以省略不说,这样一来就成了“住北京”,即述宾结构。林焘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北京住”中的“在北京”跟“住在北京”中的“在北京”不能等同,因为这两个

结构中的“在”在北京土语里的读音并不一致,而“在北京住”中的“在”的读音与动词“在”的读音却是一致的。因此,“在北京住”是“(x+宾语)+动词”(偏正结构),“住在北京”是“(动词+y)+宾语”(述宾结构)。在名词+方位词的结构中,方位词“上”、“下”、“里”常常轻读,并且意义也常常是引申义,因此,林焘先生认为,把这样的结构统统分析成偏正结构不大合理。他主张把这类语音表达上为轻音、意义上使用引申义的方位词看成是名词的补语,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避免了语音上为轻音的音节作词组中心语的尴尬,第二个是满足了语法结构整齐性的需要,因为在现代汉语的三类最重要的实词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在前面带修饰语,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在后面带补语,把读轻音的方位词看成名词的补语就填补了名词不能在后面带补语的空白。

第四部分 实验语音学研究

《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1983年)

北京话轻音音节有着区别于正常重音音节的若干语音特征,其中的哪一种是音位性的特征,是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看法是,轻音重要的特征就是音强比较弱。这项研究采用心理一声学的实验方法,考察了音长、音强和音高三种物理要素在北京话轻音音节听辨中的作用。音长的改变方法是分别减少和加大“重重”型和“重轻”型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的长度;音强的改变方法是分别减少和加大“重重”型和“重轻”型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的强度;音高的改变方法是把“重轻”型双音节词的轻音音节的基频改为平调、升调和降调三种类型,每种音高类型都伴随有音节长度的加大。实验任务是要求听音人对所听词的重音格式进行判断。实验结果表明,改变音强对听音人的词重音感知没有大的影响,而改变音长对于重音格式的感知则有重要的影响,第二个音节音高曲线的模式对于重音感知也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音长是听辨北京话轻音最重要的参数,在

音长的制约下,音高与轻音的听辨也有一定的关系。这篇文章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关于音强与轻重音关系之间的模糊认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音长和音高在轻重音感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文章甫一发表,就在中国语音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是汉语轻重音问题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

《声调感知问题》(与王士元合作,1984年)

这项研究通过改变双音节词前后两个音节的高低关系和长度关系,研究了双音节词中的声调感知问题。实验结果证明,双音节词中音节的声调感知是以彼此之间的音高对比关系为条件的,一个音节音高的改变,会导致另一个音节的声调在感知当中的变化,这是声调感知中的一种“听错觉”现象。这个研究的结果还表明,音节的长度对于声调的感知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当一个携带平调的音节较短、并且它后面的音节基频比它高的时候,这个平调就会被听成升调。文章认为,多音节词中声调的听错觉可能就是连读变调和声调历史演变的触发因素之一。

《京剧韵白声调初析》(1990年)

林焘先生一生雅好昆曲和京剧。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同为京剧爱好者的王力先生而作。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和戏曲工作者对京剧韵白的声调进行过研究,但这些研究依靠的都是主观的听觉感受,林焘先生是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分析京剧韵白声调的第一人。为了避免韵白特有的语调对声调音高的干扰,同时也为了调查韵白中的连读变调形式,文章使用孤立的双音节词作为研究对象,发音字表囊括了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种声调互相配合的16种调型组合。发音时用老生行的念白,因为老生的念白在各行当中最具代表性。使用音高仪分析基频。分析结果表明,京剧韵白中的四个声调可以分为高调和低调两个类型,阴平[55]和上声[35]为高调,阳平[121]和去声[31]为低调。文章还提出了韵白中复杂的连读变调格式。

第五部分 汉语史研究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1962年)

林焘先生曾与陆志韦先生合作撰写过长篇论文《〈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对《异文之分析》的简要概括，也是对《异文之分析》内容的一个延续。文章介绍了陆德明其人以及《经典释文》的性质、成书年代、版本沿传等问题，重点分析了《释文》中的音注问题和校勘问题。陆氏为经文注音皆有所本，并非他自己的创造，但在编排前人的音注时又有所斟酌，林焘先生认为，陆德明在古今音注中是先今后古，在南北音注中是取南舍北。他指出，陆氏在取舍音注时所依据的音系并非他自己的母语苏州话，而是当时在士大夫阶层很有影响力的金陵（今南京）音。对于校勘，文章重点介绍了单字校勘中所出现的异文，异文与正文同声旁的案例占了异文的一般以上，这部分异文显然是由古代的假借字造成的。其余的异文又可分为错字、异体字、近义字、同音字和音近字。林焘先生认为，异文中的音近字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类，其中《广韵》不同音和上古音相近的字是研究上古音系的宝贵财富。

《“入派三声”补释》(1992年)

这篇文章研究了两个问题：一、《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否足以证明入声在当时已经消失；二、入声在今天北京话中的分派规律。关于《中原音韵》是否保留了“入声”的问题，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作者周德清自己对于“入派三声”的解释似乎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林焘先生指出，尽管自《中原音韵》的时代起，入声在北方的许多地区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入声始终顽强地存在于读书音中，甚至20世纪前半叶的语言学家在拟定注音字母和编纂韵书的时候对入声仍然“恋恋不舍”。因此，不能因为600多年前的周德清的“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之说就断定《中原音韵》时代仍有入声。关于入声的归派，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古清入声字的声调在今北京话中的分派没有规律，唯白滦州认为古不送气清入

归阴平,送气清入归去声。林焘先生通过对 198 个没有异读的古入声字在今天北京话中声调的统计,发现送气声母、擦音声母和中古影母入声字的声调具有相同的声调归派规律——归入去声的 60%左右,归入阴平的 30%左右,其余的归入阳平和上声。不送气入声字独成一类,约有一半归入阳平,另一半归入其他三个声调。文章还观察了有异读的古入声字的声调,发现清入声字除了符合规律的一读外,另一读绝大部分是阴平。由此可见,古清入声字在今天北京话中的分派并非完全无规可循。文章还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提出了古清入声字分派规律性较差的可能原因——入声字发音本来就比较短促,清声母音节比浊声母音节的带音段更短,因此在听觉上的音高可分辨性就更弱一些。

《日母音值考》(1995 年)

文章以倒叙的方式分析了现代、中古和上古日母的音值。关于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音值和音韵地位,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林焘先生从实验语音学家的数据中发现,现代北京话中日母的声学特征与通音相近而与擦音相去较远,这一发现为确定日母在音系上属于通音而不属于擦音一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文章还明确指出,北京话的通音声母 *r* 的发音与舌尖后元音 [ɿ] 在发音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国际音标一直没有单列所谓舌尖元音也是有道理的。但从功能和音节结构的角度看,在描写时将卷舌通音声母和舌尖元音分开也还是有必要的。关于中古日母的音值,文章根据现存的音韵史料、日汉对音资料、方言资料 and 传统戏曲语言等材料推测,从中古至今,日母在北方通语地区一直以浊擦音或通音为主,在以吴语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则一直以鼻音为主。文章还根据谐声字的情况推测,至少在《诗经》时代日母的音值就存在方言上的分歧,当时鼻音是雅言的读法,擦音则只是少数方言的读法。这篇文章研究的是汉语史的问题,但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时候,融入了现代语音学和实验语言学的元素,因此堪称是将现代语音学和汉语音韵学进行有机融合的典范之作。

王 韞 佳 沈 炯

2010 年 8 月于北京大学燕园